

海国图志丛书

赵鼎新 著



夏江旗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上海三联书店

东周战争与 儒法国家的诞生

东周战争与 儒法国家的诞生

赵鼎新 著 夏江旗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周战争与儒家国家的诞生 / 赵鼎新著; 夏江旗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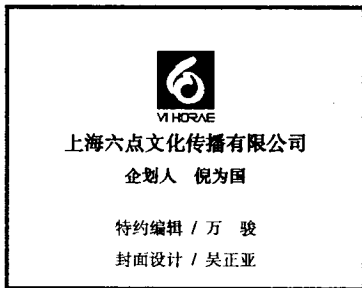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8

ISBN 7-5617-4879-5

I. 东... II. ①赵...②夏... III. 中国—古代史—

研究—春秋战国时代 IV. K 22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94718 号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世界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六点学术·海国图志

东周战争与儒家国家的诞生

赵鼎新 著

夏江旗 译

统 筹 储德天
责任编辑 储德天
责任制作 李 瑾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上海三联书店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 话 021-62450163 转各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www.hdsdbook.com.cn
市 场 部 传真 021-62869887 021-62602316
邮 购 零 售 电话 021-62869887 021-54340188
印 刷 者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x 1240 1/32
插 页 2
印 张 7
字 数 145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7-5617-4879-5/K·278
定 价 18.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市场部或者联系电话 021-62865537)

海国图志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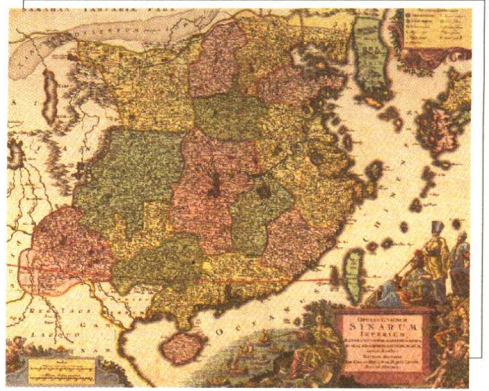
编委

赵明 林国基 郑文龙 林国荣 肖厚国 林国华

本辑责任编辑

郑文龙 林国华

西南政法大学 法学研究所 主办



Opulentissimum Sinarum Imperium
(中华帝国华彩图)

此图由德国18世纪绘图家Mattheus Seuter 绘制于1745年。在这幅地图中，最不平常的地方是中国的士大夫与西洋的将军以及神祇和平共处。

本书的血脉虽取自先人魏源，但就性格和目的而论，
这些年轻的作者并不自感“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召唤。

ὅσιον προτιμᾶν τὴν ἀλήθειαν

——*Amicus Plato, sed magis amica veritas*

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

总序

“海国图志”书系之宗旨是“以图言志”。对万国法律，尤其是万国地理、万国历史的精深研究是本书系的骨髓所在。

近世以来的知识激增，专业学者几乎完全不再像斯特拉波(Strabo)那样尝试在单卷本中描述一个具有足够包容度的历史或者地理主题，而是将此工作留给那些很少会像本丛书作者那样感到问心有愧的业余学者和作家，由此所导致的一个文明大悲剧是：人们往往只是从那些余热尚存的业余流派中汲取灵感和教诲，而这些东西只不过是可怜的灰姑娘罢了。

我们的目的不是提供万国历史、地理或法律的政治编年史，更不是一般社会和统治精英的政治编年史，而是一些应当予以表述出来的政治、经济、法律的浅显易懂的篇章；丛书尊重地区和国家的框架及其演讲，对自从有人类创造文明和野蛮、战争与和平以来的各个阶层、等级和民族的问题均予以足够分量的注意。

诚如上世纪英国伟大的史家考伯(Richard Kauper)所说的那样，历史包含了“大量的推测成分，它试图倾听不可倾听的声

音,并洞穿人们心中的奥秘”。对于本丛书的作者来说,这些超越了他们学术专业知识的推测范围非常大,更不用提那些对于万国历史、地理与法律是外行的人。我们将怎样达到目的呢?首先,运用民族的偏见和成见;其次,利用我们对历史记载的所谓专业知识所不可避免的、但反过来说也是令人庆幸的匮乏;第三,利用撰写由读者去判断的新类型的国家史所带来的挑战。

必须强调的是,本丛书的血脉虽取自先人魏源,但就性格和目的而论,我们的年轻作者们并不自感“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召唤。 ὅσιον προτιμᾶν τὴν ἀλήθειαν — *Amicus Plato, sed magis amica veritas*: 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本丛书的年轻作者们皆以此自勉。

谨将此书献给母亲傅石榴并纪念先父赵仲辉

作者序

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大地上上演了一场“批林批孔”的闹剧。在此期间，极“左”势力控制下的宣传机器开足马力把中国历史演绎成一部阶级斗争史，把所谓的儒、法斗争描述为中国阶级斗争的主要表现形式，并以此影射现实政治和扩大文革的打击面（即所谓“批林批孔批周公”）。“文革”期间，在“上山下乡”的大环境下我离开上海去宁夏。“批林批孔”运动开始时我在银川一家工厂当工人。该工厂主管宣传的干事是一个很能干的人。据说他是著名散文家秦牧的高足，“文革”中因受牵连而被下放到宁夏。“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极“左”势力动员普通百姓在工厂甚至农村写各种批判文章，为运动造势。在此环境下，我所在厂的宣传干事牵头组织了一个由五个青年工人组成的学习和写作小组，我有幸忝列其中。

我们这代人成长于一个极其畸形的环境，在“批林批孔”运动之前我从未有机会接触过任何教科书以外的中国历史和哲学思想，而加入这一小组使我第一次有机会阅读荀子、韩非子、孟子和孔子等人的哲学著作与《盐铁论》和《封建论》等历史名篇，

以及郭沫若的《十批判书》、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和杨荣国的《中国古代思想史》等当代著述。虽然我当时的知识水平极低，所看过的一些当代著述的观点也十分偏颇，但即便如此，在读了一些原著和历史书籍后，直觉仍然告诉我：中国历代思想家不能简单地被归类为儒家或法家；中国的历史也不是什么儒、法斗争史。这就让我产生了困惑。在当时的环境下，任何思想上的困惑都是非常危险的事情。远的不说，在我们的厂里就有一位青年工人在小组会批判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时，仅仅因为说了一句“刘少奇说的都是一些大实话”而受到批判并被处以记过。在这种环境下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沉默。结果，在参加学习小组近一年的时间里，我没有贡献过一行字。我的这种表现使我成了小组中的落后分子，特别是与我的一个好友相比——他在小组中脱颖而出，连续在当时国内各大报刊杂志上发表批判文章，笔锋犀利，所向披靡。在那位宣传干事眼里，我显然是一个不求上进的青年。我能看出他对我的失望，有时也为之惭愧不已。但是，这次学习小组的经历对我来说却很重要。它使我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在当时本来是很难接触到的古籍，我对中国的历史，特别是对春秋—战国时期历史的兴趣大大加深，并从此经常思索中国历史的种种特点及其解释。

“四人帮”倒台后中国社会走向改革开放之路。此间出现了“伤痕文学”、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关于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讨论，以及随后兴起的“文化热”（即把文革的悲剧归因于中国文化的专制性，从而展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鞭挞）。在这一波又一波的开放浪潮中有一本书特别引起我的注意，那就是金观涛和刘青峰所著的《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该书提出了帝制中国历史“超稳定结构”

的理论,其核心观点是:帝制中国的各个朝代随着时间的推移都免不了出现官僚体系膨胀、专制腐败、土地兼并、恶霸横行等“无组织力量”的发展并最终导致王朝的垮台。但是,由于中国存在着儒生这样一个阶层,他们所持的儒家学说为建立新的国家结构起着理论指导作用,而儒生本身又是王朝重建的核心力量,所以帝制中国的新兴王朝总是旧日王朝的翻版。帝制中国“系统”这种强大的“修复性机制”使得它在朝代更替中永远停滞不前,即所谓的“超稳定结构”。因此,中国的专制体制得以延续,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顶多处于边缘状态,它们只是王朝崩溃之前出现的“假资本主义”。从现在的角度来看,这本书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但是,它发表时正值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对“文革”悲剧进行反思之际。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倾向于把“文革”的起源归因于中国“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专制文化。而金、刘两氏的著作则对中国的“封建社会”为什么那么长久这个问题作了回答。他们的著作在机械的历史唯物主义尚很盛行的当时让人读起来有耳目一新之感。该书一经发表马上就引起了它应有的轰动,并对当时中国的社会思潮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正是在金观涛和刘青峰工作的刺激下,当时作为一名自然科学工作者的我却保留了对社会科学的兴趣,特别是对中国大历史的兴趣。就这样,在多年的治学生涯中,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以及这些特殊性得以形成的历史原因,总是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悬在我的脑海中。

1990年我弃理从文转攻社会学。在此后的时间里,虽然研究的都是中国当代的社会问题,但我对历史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兴趣始终浓厚。在此期间,我阅读了大量的历史社会学和历史学著作(特别是围绕为什么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率先在欧洲兴起这个问题所产生的种种分析和解释),阅读了许多西方学者对

中国历史特别是春秋—战国历史所做的分析。这些著作的质量有高有低,但是阅读大大开阔了我的眼界,进一步加深了我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和兴趣。我对中国历史发展形态的解释也在这些阅读和思考中逐渐成型。

三年多前,在完成了一系列社会学领域的工作之后,为了给自己多年来对历史的种种兴趣和思考有一个交代,我开始了一个以春秋—战国史为核心的中国历史研究计划。在此工作展开一年后,我用英文写了一篇长文,表达我对中国历史的理解。当时写作此文的目的仅仅是为了给我的整个工作计划制定一个提纲——它既能整理我的思路,又能达到在朋友间传阅以征求意见的目的。在此文的传阅过程中,我的两位年轻朋友——林国基和林国荣——认为国外做学问周期太长,而本文具有一本小册子的篇幅且有很大的独立性,探讨的又是中国人所关心的问题,所以应该在国内先行发表,以飨读者。他俩为本书寻找了出版社和翻译,并且在翻译过程中多次敦促协调。没有他们的帮助和友谊,本书不可能问世,我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本书的翻译工作由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夏江旗完成。江旗手头上有不少课题,翻译工作因而时断时续。但是为了翻译此书,江旗曾反复阅读《左传》和《史记》等古籍,对那段历史用心揣摩,在文字上也下了很大工夫,我在此对他谨表谢意。在本书写作的不同阶段中 William Parish、Edward Laumann、Andrew Abbott、冯仕政等人都提供了宝贵的意见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本书缘起于一篇本来没想过要发表的文章或者说是一本书的写作提纲,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些缺点。比如,书中的理论尚未充分展开、许多概念的定义还不够精确;由于写作的初衷不是为了发表,所以书中许多资料和观点的征引比较粗略,考证

和分析也有待加强；本书基本上没有涉及春秋—战国时代的国际关系及其对当时历史发展的影响；本书对战国时期各国强大战争能力的经济基础的考证十分薄弱；本书对目前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尚很少运用；本书对汉朝以后的中国历史基本是一笔带过，各个朝代之间的巨大差异及其对后代的影响均在这三言两语中打发了。我最近几年的工作都旨在对本书中存在的这样那样的弱点加以弥补。不过，随着我最近工作的日益深入，早期的许多非根本性的观点也在不断得到纠正，但我目前的工作尚未对本书中的主要观点形成挑战。因此，我想借本书在国内的发表以抛砖引玉，希冀得到国内同仁的批评指正。

赵鼎新

2006年5月于芝加哥大学

目 录

第一章	引论	1
第二章	本书论点的进一步阐述	6
第三章	相关研究回顾	12
第四章	本书的理论及其渊源	20
第五章	西周体制及其衰落	34
第六章	东周历史的分期	43
第七章	霸主时期(公元前 770—前 546 年)	52
第八章	转型期(公元前 546—前 413 年)	76
第九章	全民战争期(公元前 419—前 211 年)	102
第十章	儒法国家的形成	148
第十一章	中国历史的模式	165
附录一:	本书对东周时期战争信息的计量方法	183
附录二:	评许田波《古代中国和近现代欧洲 的战争及国家形成》	185
	主要原始文献	198
	参考文献	200

第一章 引论

与世界上的其他文明相比,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帝制时代中,中国历史至少呈现出了如下七项主要政治特征:

一、世界史上其他诸帝国一旦灭隳则不复重兴,唯有帝制中国自公元前 221 年秦帝国建立迨至 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其间虽历经数番朝代兴衰隆替,但一个相似的帝国政体却得以延运续祚、绵久不绝。

二、早在秦朝统一前后,中国便出现了科层制政府并逐渐形成和完善了一套择优录用的科层选拔体制(meritocratically selected bureaucracy),远早于欧洲形成类似政制近两千年。^①

三、中国有世界几大文明中最为显著的强国家传统。

四、在古代世界的其他地方,军队将领一般拥有决定性的政治影响力,而在中国帝制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军队由文官控制,除非内战乱世,武将一般没有干涉政事的能力。

^①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951: 第 61—62 页)指出,中国战国时代与近代欧洲都存在着一个相似的“行政管理理性化”过程。他是最早指出这一点的学者之一。

五、世界史上绝大多数帝国均凭借军事征服以实现领土扩张,而帝制中国的开疆拓土,特别是其在北方影响的扩展,常常是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土之后自身汉化的结果(Creel, 1970: 第197页)。

六、与其他世界文明体系相比,唯有在帝制中国,超验宗教未曾对政治发生重大影响,而政府又对各种信仰抱有较高的宽容态度。

七、与欧洲不同,商人阶级在帝制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不具有重要的政治地位,即使在商业化和城市化水平臻至顶峰的北宋(960—1127年)时期,亦是如此。

为什么中华文明的历史与其他文明,特别是西方文明相比会有上述诸多不同?在这本小册子中,我将对帝制中国的以上七个政治特征作出一个统一的解释。

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前221年)至西汉前叶(公元前206—前140年)是中国历史模式形成的关键时期,帝制中国的上述特征,皆可于这一历史阶段察其端倪。因此,本书的另一主要目的便是对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演变进程作出分析和解释。本书的中心论点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封建制度导致了诸侯国之间频繁而输赢不定的局部性战争(frequent but inconclusive wars),正是在这类特殊类型的战争中所形成的竞争和冲突,促进了效率导向型的工具理性文化(efficiency-oriented instrumental culture)在军事、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领域的扩展,进而为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各领域的演变提供了根本动力。但是,由于当时中国社会所具有的特殊的(譬如,与古希腊和中世纪欧洲相比)结构性条件,这一推动社会演进的战争力量最终却为国家所驯服。进而,在秦朝(公元前221—前206年)